

威海海防圖



甲午战争九十周年纪念论文集

山东省历史学会 编

戚其章 主编

齐 鲁 书 社

一九八六年·济南

甲午战争九十周年纪念论文集

山东省历史学会编

戚其章 主编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6印张 3插页 357千字

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500

书号 11206·119 定价 3.85 元

六折 2.31元

说 明

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重大事件。1984年9月20日到25日，在中国史学会负责同志的关怀和指导下，由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编辑部、《近代史研究》编辑部、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会和山东省历史学会联合发起，在当年甲午战争的重要战场——威海市举办了甲午战争九十周年学术讨论会。来自全国十五个省市的八十多名史学工作者出席了讨论会，提交给会议的论文共九十余篇。这本论文集所收的三十一篇文章，都是从这次讨论会提供的论文中选出来的，其中有几篇因未来得及打印，在会上没有分发。由于篇幅所限，收入的文章中有一些做了不同程度的删节。书后附录了一篇《甲午中日战争史论著索引》（1950—1984年），以供读者参考。

编 者

1985年3月14日

目 录

甲午战争历史意义的再认识·····	章开沅 (1)
略谈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背 景、过程及其影响·····	丁名楠 (6)
甲午战前朝鲜的国际矛盾与清政府的失策·····	陈伟芳 (24)
甲午战争前的北洋海军·····	胡 滨 (51)
甲午战争前夕的日本社会 和战争的基本原因·····	米庆余 (72)
甲午秘史二题·····	吕林岫 (97)
甲午战争前的中日交涉·····	刘恩格 (108)
袁世凯与甲午战争小议·····	侯宜杰 (123)
试论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手段·····	李兆铭 (134)
试论中日甲午战争时期的 帝后党争与和战之争·····	江中孝 (147)
载湉、李鸿章与甲午战争·····	苑书义 (161)
翁同龢与甲午战争·····	谢俊美 (186)
从档案记载看甲午战争中的李鸿章·····	宋秀元 (200)
刘坤一与甲午中日战争·····	关 捷 (210)
李鸿章与北洋舰队的覆灭·····	王楚良 (224)
甲午战争时期东三省练军琐谈·····	刘树泉 (241)
简述甲午战争时辽东战场	

清军后勤的几个问题·····	潘国华	刘玉岐 (249)
甲午战争期间辽宁人民		
自发抗日斗争述略·····	孙克复	(263)
日英、日俄关系与甲午战争·····	夏良才	(277)
中日甲午战争与俄国的远东政策·····	王魁喜	(298)
三国干涉还辽的实现及其影响·····	杨遵道	(313)
台湾民主国简析·····	邱远猷	(327)
台湾人民阻止清朝政		
府割台斗争述论·····	胡绳武	孔祥吉 (339)
论民族英雄柯铁·····	戚其章	(353)
甲午冲击在思想文学领域引起的变化·····	李侃	(368)
甲午战争与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觉醒·····	商鸣臣	(385)
甲午战争与严复·····	郑永福	(398)
甲午战争前后黄遵宪对日本的认识·····	陈铮	(412)
中日甲午战争与洋务运动·····	姜铎	(426)
甲午战争失败宣告洋务运动		
“彻底破产”说辨析·····	余明侠	(443)
甲午战争与洋务运动发展的新阶段·····	茅家琦	(460)
附录：甲午中日战争史论著		
索引 (1950——1984年)·····	戈之扬	(471)

甲午战争历史意义的再认识

章 开 沅

今年是甲午中日战争九十周年，再过十年，就是整整一百周年了。人们对于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评价，往往相隔时间愈长，则论析愈接近于深切。这是由于历史事件的深远影响，特别是在经济、文化方面的影响，需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能显示得比较清晰。同时，也只有保持一定的间隔距离，评论者才能愈加注意采取冷静的、客观的态度，尽量排除某些主观因素（如义愤、抨击、忌讳、谀颂等等）的干扰。从这个角度来说，现在提出甲午战争历史意义再认识的问题，似乎并非多此一举。

近些年来，主要是由于山东、东北一些同志的勤奋工作，甲午战争的研究经由长期沉寂走向空前活跃，论文专著大批问世，探讨的广度和深度都有明显的扩展，许多成果已开始为海内外学者所瞩目。但这一进展毕竟是初步的，已经发表的论著的视野大多集注于战争本身，侧重于战役过程与有关人物的论述辨析。至于从宏观方面，从世界全局，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来研究甲午战争，进一步探讨其深远影响及历史意义，则还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

广义地说，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上一座重

要的里程碑，也可以说是民族新觉醒的真正发端。中国是一个以农业宗法社会为根基的古老帝国，历代王朝莫不利用忠孝观念以维系自己的统治，孝为忠之所本，实则就是构成一个以家族为单元的、多层次的、纵横交错的宗法网络。尽管中国早已形成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但人们的国家民族观念却长期依附于农业宗法社会的古老范畴。直至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才逐渐使传统的“华夷之辨”及宗庙社稷等陈腐观念增添了若干新的思想内容。但是，这种意识形态上的转变是非常缓慢的，传统文化惰力阻碍了人们前进的脚步，需要内部和外部的、再三再四的强力冲击，才有可能使古老的民族从长期沉睡中惊醒过来，真正出现近代意义的思想解放。甲午战争就是这样一次强力冲击，而且它对于中国社会的震撼程度也远远超过两次鸦片战争和中法战争。或许可以说，中国人的近代民族意识和国民意识，都是在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才明显萌发的。

甲午战争，日本以一个小国打败了向来以天朝大国自负的中国，这不仅扫除了统治者的盲目骄妄之气，而且也促使许多先进的中国人重新认识、评价自己的民族和国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进步需要以自我否定为起点。“人道船坚不如疾，有器无人终委敌”。过去只承认船坚炮利不如外国，现在则进一步认识到“人”的落后是更为严重的问题。传统观念的权威动摇了，人们对神圣的古老经典产生了怀疑，同时又从西方的名著如《天演论》之类那里吸取了新的信念。原来“人先为猿”、“人猿一宗”，老百姓和皇帝一样，中国人和外国人一样，都是猴子的后代，都逃不脱“物竞天择”的铁律。“其种愈下，其存弥难”。“丰者近昌，啬者邻灭”。于是，十九世纪末年

才出现了严复那样的近代哲人，他的吁叹含蕴着民族觉醒的心声。“此洞识知微之士，所为惊心动魄，于保群进化之图，而知徒高睨大谈于夷夏轩輊之间者，为深无益于事也。”^{〔1〕}于是，人们才接触到国民素质（即国民性）问题，开始了民智、民德、民力诸问题的探索。而国民又是与近代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国民不再是君主的子民，实乃国家的主体。国民改善自己的素质，同时也就改变自己在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此即所谓“保群进化”之真意。如果说，欧洲近代国民意识的萌发，是始于从神性中发现了人性；那么，中国近代国民意识的产生，则几乎与进化论的传播同步。这不仅是由于中国近代启蒙思想的崛起为时已晚，因此有现存的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可以作为凭借，而且还因为甲午战后中国已经面临着空前严重的帝国主义瓜分狂潮，民族危机感促使人们迅速接受了“物竞天择”的天演法则。

从纵的系列来看，戊戌时期的强学保种，辛亥时期的以国民与奴隶相对立，乃至五四时期的倡导科学与民主，都是源起于甲午战后的思想启蒙运动。即此一端已足以说明甲午战争历史意义的再认识也还有许多文章来做。

如果从世界全局来考察，则甲午战争对整个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也是极为重大的。日本成为举世瞩目的亚洲强国，先与沙俄争夺，继与美国抗衡，引起了东方以至西方政治、经济、军事态势的一系列变化。再就日本自身而言，甲午战争固然使它成为东方的暴发户，一举跻入列强圈中，但同时也从此走上顽固不化的军国主义道路，不仅使亚洲邻国备受欺凌和战祸之苦，而且也使日本人民历经法西斯暴虐统治，最后导致1945年的全盘惨重失败，这真是莫大的历史悲剧。甲午战争以后五十

年的历史，是引起日本民族严肃反省的痛苦历史。正如最近逝世的实藤惠秀教授在其大著《中国人留学日本史》序言中所说的那样：“从甲午战争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的五十年，是中日关系最恶劣的时代。就1937年开始的八年侵略战争而言，日本军国主义者蹂躏中国广大幅员要地，残杀一千万中国人，损毁五百亿元的财产。对日本人来说，这是一个无面目见中国人的时代”。战争同样也给日本人民带来莫大的灾难。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纪念碑是这一场浩劫的历史见证，而那手执柳枝、脚踏莲花、悲天悯人的巨大观世音塑像，则充分反映了日本人民反对战争和祈求和平的恳挚心愿。1981年深秋的一个夜晚，我与日本友人在东京浅草一家小酒店对酌闲话，邻座有位商人模样的老者忽然站起来向我郑重叮咛：“请转告贵国同胞，就说有个当年侵华日军的士兵，他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反对侵略战争的”，并且带着歉疚的表情频频鞠躬告别。此时此际，正在殷勤待客的女店主已是凄然泪下，原来1945年她新婚未及三日丈夫即应征入伍，随即在去东南亚的海路上被炸死了。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发起的一系列侵略战争，给中日两国人民带来多么深重的祸患呵！历史是难以忘记的，也是不应该和不可能忘记的。对于甲午战争历史意义的再认识，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事，也是日本人民的事，甚至还是世界人民的事，因为这将成为中日人民乃至世界人民之间友好交往的新的思想基础。

关于甲午战争的研究方法，也有继续加以改进的必要。即以对战争期间的各派政治力量的论析而言，过去我们的研究往往侧重于定性，或者是习惯于从历史人物的主观动机来判断其社会功能，因此不容易获致切近于历史实际的科学结论。其

实，历史人物或政治集团的活动轨迹，并非单纯用主观动机所能解释得清楚。个人或集团的依违向背，常常取决于两种考虑，一是利害权衡，一是力量对比。趋利避害，人之常情，但政治趋向最终还得受力量消长的制约，所谓政治力学（或称力的政治）其真谛即在于此。甲午战争期间，各派政治力量，诸如洋务派、顽固派、维新派、帝党、后党等等，形成了新的动荡与组合，主战与主和之间的激烈争论暂时掩盖了既有的派别之间的矛盾。但是，当时还很难说已经形成了严整的主战与主和两个营垒，主战者并非完全拒和，主和者也并非完全拒战，而最高统治者慈禧则摇摆依违于两者之间。这样复杂的政治局势是很难用简单图解的办法来加以表述的，必须从利益和力量两方面给以剖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种过渡型的社会形态，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错综复杂，一切事物都在不断流转变化的之中，因此在研究中更加需要注意历史的辩证法并防止形而上学。

甲午战争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而且具有极其丰富的历史内容，甲午战争史研究领域的不断开拓，必将有力地促进整个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因此，我才发表上述粗浅的意见，以供甲午战争研究者的参考。

〔1〕《天演论》导言三按语。

略谈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 背景、过程及其影响

丁 名 楠

1894年日本挑起的第一次侵华战争（甲午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次战争割地之广，赔款之巨，都是空前的，它还导致了帝国主义企图瓜分中国的大祸。此后半个世纪里，日本军国主义欺压中国，凌辱、残害中国人民，无所不用其极，是中华民族的大敌。台弯同胞呻吟于铁蹄下，过了五十年亡国奴的悲惨生活，大陆人民死于锋镝的，又何止千百万；至于直接间接受害、骨肉被拆散，家园被毁灭，美好愿望被葬送的，更难以数计。中国人民积恨成仇、奋起反抗，终于在日本发动的第二次侵华战争（抗日战争）中，使其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遭受灭顶之灾，得到正义的惩罚。日本人民受军国主义之累，也连带遭到不幸。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现在，已将近四十年了，中日两国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且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东亚大地。今天举行甲午战争学术讨论会，不是为了抒发感慨，勾起昔日的创痛，而是本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精神，放眼未来，殷切地寄希望于一衣带水的两国人民，以往事为鉴，今后一定要世代友好下去，永远和平相处，绝对不让曾使他们遭受巨大苦难的历史重演。

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国内历史背景

甲午战争是日本发动的，它的酝酿为时已久。远在明治维新以前，就有人狂热地鼓吹侵略中国。吉田松阴(1830—1859)即是其中有名的一个。日本当时同中国一样，受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吉田没有倡导远东被侵略国家，互相支持，为摆脱屈辱地位而共同奋斗，却从狭隘自私的考虑出发，以邻为壑，积极主张侵略周围的国家。他身处逆境，在狱中著《幽囚录》，说日本“今宜急修武备，……谕琉球朝贡，会同各诸侯责朝鲜纳质奉贡，如古盛时。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渐示进攻之势”。〔1〕又说：日本“割取朝鲜，满洲，并吞中国，所失于俄美者，可取偿于朝鲜满洲之地。”桥本左内(1834—1859)也认为如不兼并中国、朝鲜的领土，“日本就难以独立”。吉田、桥本都是幕政改革派，吉田且是著名的思想家、明治维新的先驱者，日本开国元勋山县有朋、木户孝允、伊藤博文、井上馨等都是他的门徒，接受他的教诲。后来伊藤为吉田讲学的松下村塾题诗，表达对吉田的敬意，诗称：“道德文章叙彝伦，精忠大节感神明，如今廊庙栋梁器，多是松门受教人〔2〕”，足见吉田对当时日本影响的深巨。

明治维新后不久，日本就着手实现吉田等人的遗愿。1871年6月，日本政府派大藏卿伊达宗城为全权代表、外务大丞柳原前光为副使来中国订约，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伊达提出凡别国在中国享受的各项侵略特权，日本都要一体均沾，遭到清政府断然拒绝。9月，中日订立《修好条规》和《通商章程》，体现了相互平等的原则精神，但因为没有完成任务，伊达回国后

被免职。第二年，柳原来华要求对《修好条规》作多处修改，被李鸿章驳回，直到1873年外务卿副岛种巨来中国，才交换了《修好条规》的批准书。由此可见，日本与中国建交一开始就怀有险恶的用心。副岛等人这次来华还负有秘密使命，柳原以上年琉球船民在台湾高山族居地遭风遇害为口实，到总理衙门纠缠，试探清政府对琉球、台湾的态度，总署大臣毛昶熙等严正指出：“二岛（指台湾、琉球）俱我属土，属土之人相杀，……何预贵国事而烦为过问？”驳斥了琉球属日的说法，但随后又说，杀人者为“生番”，“未便穷治”，“姑且置之化外。”〔3〕日本抓住答辞中很不得体的“化外”二字，否定台湾高山族居地是中国领土，并以此为根据，准备对台湾大兴问罪之师。

日本熊本镇台鹿儿岛驻军头目桦山资纪（后任台湾第一任总督）少佐得知琉球船民在台湾遭难的消息，赶到东京报告陆军大辅西乡从道，要求攻台。日本派他和水野遵（后任台湾第一任民政长官）等人到大陆和台湾进行侦察，窥探虚实。1874年4月，日本任命西乡从道为“台湾事务都督”，率日军三千余人，在琅玕登陆，进攻台湾。清政府集调军队准备抵抗，日本侵台企图没有得逞。但同年10月两国订立的《北京专条》中，清政府不但没有加以谴责，反而肯定日本出兵原为“保民义举起见，中国不指以为不是”，〔4〕等于变相承认琉球是日本属土，助长了日本的扩张野心。1876年，它强迫朝鲜签订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江华条约》，三年后又正式吞并琉球，改为冲绳县，由此吉田侵略邻国的思想部分地成了现实。日本此后在朝鲜接连制造的壬午（1882）事变和甲申（1884）政变失败后，认为要夺取朝鲜，与中国迟早必出一战，于是积极从事对华作

战的准备。

1886年，日本军部首脑、参谋总长山县有朋派参谋本部第二局长小川又次中佐到中国作广泛调查，回国后，他提出了名为《讨伐清国策》的报告书，主张在1892年前完成对中国作战准备，以便有机可乘时，突然发起攻击。报告书的第三部分《善后处理》，赤裸裸地暴露了日本对中国的狂妄野心。它说：日本战胜中国缔结和约时，应将盛京盖州以南的辽东半岛、山东登州府、舟山群岛、台湾、澎湖以及长江两岸十里之地，直接并入日本版图。它还提出肢解中国的方案，企图将山海关以西，长城以南的直隶、山西、山东与黄河以北的河南省，江苏省黄河故道、镇江府、宝应湖、太湖，浙江省杭州、绍兴、宁波等府归日本；东北内（大）兴安岭以东、长城以北，单独立为一国，仍由清朝统治；黄河以南、长江以北，扶植明朝后裔立国，并使其割让长江以南的土地归日本；西藏、青海、天山南路，拥立达赖喇嘛，内外蒙古、甘肃省、准噶尔扶立当地各部首领，但他们都必须接受日本的监护，等等。^{〔5〕}这就是小川在报告书中勾划出的日本阴谋侵占、分裂中国领土的大致轮廓。当时日本羽毛未丰，实现这样庞大的侵华计划，当然力不从心，不免成了纸上谈兵，但它确是小川向参谋本部郑重其事地提出来的方案，不是信口胡诌。后来日本夺取辽东半岛，占领台湾，在东北制造伪满洲国，在中国各地扶植傀儡政权，在报告书里都有踪迹可寻，同吉田等人鼓吹的扩张思想不无联系，不过报告书说得更详细、具体而已。

1889年，日本颁布帝国宪法，山县任第一届内阁首相。次年，在帝国议会里首次发表施政方针，强调“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提出所谓“守卫主权线”和“保护利益线”的问题，明

目张胆地把朝鲜看作日本的利益线。山县在1878年就把辽东半岛看作是控制中国、压制朝鲜的军事要害地区，日本必须加以占领，这时更极力主张扩军造舰，要求陆海军费应占年度预算支出的大部分。1891年，沙俄宣布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以便加强对远东的控制。山县等人认为这对日本在大陆进行扩张不利，力主在通车前，击败中国，夺取朝鲜，要求加紧建造军舰。1891年，“三景”舰之一的“桥立”号建成，在法国订购的另两艘巡洋舰“松岛”、“岩岛”号于第二年完工后驶抵日本，次年又从英国购得当时驶率最高的“吉野”号，另一艘巡洋舰“秋津洲”号也于1894年竣工。日本把北洋舰队看作日本海军的假想敌，认为打败中国海军，夺得制海权是取胜的关键。为加速完成造舰计划，日皇睦仁从王室经费中拨出专款赞助，以示倡导。甲午战争前，日海军有大小军舰三十多艘，排水量近六万吨，陆军有七个师团，总人数七万五千余人，战时可扩充到二十三万人。日本积极备战，中国却歌舞升平，晏然无事。1885年成立海军衙门后，一部分经费移作修建颐和园和三海工程费之用，供那拉氏享乐。1888年清政府停止购舰，1891年户部又奏准两年内停止购买枪炮、船舰、机器。中国海军的基础原比日本强些，但日本加紧购舰造船，中国却停滞倒退，被日本赶上，差距越拉越大，反而处于劣势。

日本军部长期来密谋侵华，紧张地造舰扩军，进行备战，寻找战机，以求一逞。日本根据宪法，于1890年举行大选，产生议会，内阁方面因议会强烈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削减军费，政潮迭起，局势不稳，山县内阁一年半就垮台，继任的松方正义内阁，为时更短。伊藤博文1892年8月上台后，接连解散两届议会，压制反对意见，但第六届议会复会后又于1894年5

月30日通过对内阁的不信任案，伊藤内阁面临总辞职或者再一次解散议会的抉择。为了摆脱困境，转移国内斗争的视线，伊藤内阁走上了发动对外战争的道路。早在1894年3月，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写信给驻英公使青木周藏说：“日本国内政治形势变得越来越紧张，不能用一般手段使这种慌乱的人心安定下来。但是毫无借口就发动战争也是不可能的。”〔6〕1894年5月，朝鲜爆发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对陆奥这些人来说，仿佛是“欲渡河而船来”，于是故意纠缠不放，照他的话说，“索性使两国(中、日)关系破裂，一变阴天，使降暴雨，”决意挑起对华战争。日本驻华盛顿公使建野乡三于7月7日对美国副国务卿说：“为了使日本国民的注意力从国内现状不满中转移出来，我们宁愿反华战争。”〔7〕真是一语道破。伊藤内阁就这样地同军部一起，共同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

日本军部、内阁关于 战争的战略分歧

日本统治集团决定挑起侵华战争，但军事上能否取胜，却没有充分把握。伊藤内阁对于列强会不会进行干涉，更是忧心忡忡。日本军部和内阁在发动对华战争这点上是一致的，但是对战争的战略和策略方面，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开战后不久，伊藤博文起草了一份意见书，估计西方列强必然会用武力进行干涉，他强调日本必须文武协调，使战略和策略一致起来，对战争采取速战速决的方针。〔8〕

明治维新以后，因萨摩、长州等西南诸藩在推翻德川幕府中立了大功，由这些藩出身的武士政治地位高、势力大。1878